

如何解讀毛澤東：一個導論

——試論晚年毛澤東研究的四個層面

◎ 蕭延中

本文只是對問題的假設，而不是對問題的證明。換言之，我們的目的是強調「問題」的複雜性，並試圖提出證明這些問題的若干可能性構想。以此就教於專家學者。

一 問題的複雜性

早在1966年「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就曾指出：「毛澤東（或毛主義集團）與中國共產黨的對立，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¹這與其說是一個已被應驗的預言，不如說是一個深刻難解的問題。作為一位精明且自負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行為中的確存在著有諸多令人費解的關鍵環節。換言之，他出人預料的想法和舉動常常讓研究者不知所措，左右為難。在非常直觀的層次上，把這些思想和行為歸結為一位孤獨老人晚年之「潛意識」心理衝動的後果，似乎並非完全沒有理由，但就在這些表層「非理性」的背後，我們卻又能清晰地看到毛澤東竭力追求的明確目標，這些目標已經遠遠超出了對其自身政治權力的捍衛。因為，在過去的那個年代裏，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支配力，包括制度控制和心理影響，都不是任何挑戰者可以與之匹敵的。我們面臨著的是一個太值得深入考察的複雜難題。

毛澤東晚年思想與行為研究的複雜性反映在如下幾個相互矛盾、又共同組合的綜合結構之中：一位精明至極的典型政治家，同時又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家和情緒激烈的偉大詩人；他拯救民族、追求平等的強烈意志與整體民族自我折磨的實際效果扭曲地聯繫在一起；如此深入地浸淫於傳統典籍的熏陶之中，又把叛逆傳統作為自己的價值體現和終生使命；²「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超越自尊，卻又在時時向人們提示自己「只不過是個鄉下來的土包子」，要為「被人看不起」的「賤人」打抱不平；那幽默瀟灑、生動活潑的語言，竟會成為僵死「社論語體」的基礎模板；前現代解決中國問題的不完善理論，反而被後現代思想家視為「解構主義」的淵源，³……毛澤東晚年一次、再次地創造著悖論，給後人遺留下了無論從哪種角度看都不能不深究的問題。

顯然，單一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不足以全面地解釋複雜問題。儘管在某一個層面上，某一種解釋不僅不無道理，而且非常精彩，但其令人不能滿足的地方則在於，相反的說法同樣也可達到相同的效果。由於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與行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綜合體，我們必須避免單一解釋的思路而另闢蹊徑。這樣，我們就有必要把毛澤東晚年思想放到一個多層面的研究框架和長時段歷史情境之中去考察。而這些不同的研究層面之間必然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同

一性，而這種同一性正是使毛澤東成為毛澤東的精神底蘊；同時，這些層面之間的抵牾、衝突、緊張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毛澤東晚年思想也就沒有甚麼「複雜性」可言了。最後，當我們把上面的「同一性」與「緊張性」置入一個更大、更深的歷史語境之中去的時候，毛澤東晚年思想的脈絡可能會更清晰一些，甚至那種思想體系的根源會超越作為個體的毛澤東自身，成為近代中國建構民族國家歷程中的標誌性里程碑。

這裏，我們嘗試著把毛澤東晚年思想和行為劃分為「政治事件」、「思想結構」、「心理動機」和「歷史情境」四個角度的研究層面，最後嘗試用「症候閱讀法」對其進行初步的解讀。

二 政治運動的社會意義

在「政治事件」的層面上，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據官方公佈的統計，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毛澤東逝世的26年間，僅就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計有70多次，平均每年2.5次強，而地方一級的運動則要超出這個數字的10倍。⁴ 毋庸贅言，密節奏、高頻率的集體動員是毛澤東時代所特有社會政治整合方式，這是另外一個議題。這裏我們所關心的是，在這個運動旋渦中的核心運動背後，是否存在著某種可能被清晰把握住的基本線索？

就其大端而言，建國初期的「理論學習」和「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目的顯然是論證和普及新生政權的合法性，使人們在政治意識的深層次得到統一。但自以後，政治運動開始複雜化，大致可看出幾個明顯的波段：第一、從「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黨內就產生了意見分歧；緊接著1956年的「黨內整風」並連帶引發了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應當說，「黨內整風」是針對「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黨內分歧而來的，而恭請黨外人士提意見的本意是尋求外部力量的支持，而後果卻反而招來了對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挑戰。第二、當「反右」運動平息後，開始了「大躍進」運動，再次「向自然開戰」。運動後期黨內再次出現分歧，於是爆發了「廬山會議」。以後是「中蘇論戰」，「修正主義」被提上政治議程。第三、1962年的「四清」運動普遍波及黨的基層幹部，社會「新階級」的概念被提出。第四、是1966年開始「文革」，矛頭直指被定義為「黨內走資派」的高級領導層。

透過紛繁複雜的事件表象，研究歷次政治運動的主題、節奏和頻率，我們可以模糊地感覺到，一切變化和爭論都圍繞著「建構新國家的治理方式」和「對不同治理方式之性質的理解」這兩個問題而展開。從現代政治學的視角上看，前一個問題應歸屬於「政策-行政」的經驗層面，但由於中國共產黨處於唯一執政黨的地位，所以「黨內」關於治理方式的爭論，就自然超越了「治理」層次，變成了真正的「政治」問題。進而，「國家治理」（第一問題）就被「整黨整風」（第二問題）所替代，成為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之核心，關鍵之關鍵。毛澤東本人則用「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概念來概括這個「核心」與「關鍵」。如果說1956年發動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是試圖借助外部因素「整黨整風」，那麼，1962年「四清」運動則是啟動黨的上層力量清理黨的基層組織，而「文革」則再進一步，發動全民、特別是普通民眾對全黨各級組織進行翻天覆地的徹底整治。

所以，在既定體制的機制作用下，毛澤東晚年政治行為的真正動力，恰恰來源這一既定體制自身：對執政黨內部之結構優化的不斷需求和自我約束機制的強化調整。筆者認為，制度因素才是貫穿於複雜運動現象背後的社會本質。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那些社會運動看成是由這一國家組織結構所產生出來的功能。如果說，從根基上捨棄結構而僅談功能，在理論

上是本末倒置的，那麼，就運動的功能而論運動的影響，也就等於同語反覆。

三 政治思想的邏輯結構

在「思想結構」的層面上，毛澤東晚年形成了一整套邏輯清晰且充滿倫理色彩的政治理論。正如許多學者都曾指出過的，毛澤東具有鮮明的「大眾主義」（populism）情結，「人民」或「群眾」的確被毛澤東賦予了前所未有的神聖地位。他甚至斷言：「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我們懷疑這兩條原理，那麼就甚麼事情也做不成了」。⁵顯然，將「相信群眾」置於「相信黨」之前，並把它視為除此之外「甚麼事情也做不成了」的首要「基本原理」，這不僅絕非語言排列上的疏忽或失當，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某種本質。

在取得國家政權以前，毛澤東曾多次闡發過這樣一個思想：在舊中國，人民群眾身受「三座大山」的壓迫，實際上處於被統治的奴隸地位。由於政治實力的懸殊和理論水平的局限，作為「奴隸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發地推翻舊有的統治，成為「主人的人民」。他們只有集中自身的精華，形成與統治者相抗衡的先進思想和階級先鋒，構成強有力的凝聚優勢，以此作為自身價值的代表和「中介」，才能完成由奴隸上升為主人的轉變過程。毛澤東明確指出，這個「精華」、「先鋒」和「中介」就是中國共產黨。他反覆強調，「為甚麼要有革命黨？因為世界上有壓迫人民的敵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敵人的壓迫，所以要有革命黨。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說來，就需要一個如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人民要想推翻敵人的壓迫，簡直是不可能的」。⁶這也就是說，共產黨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為它實際上充當著人民由「奴隸」上升為「主人」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其政治功能則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共產黨的出發點與歸宿點，只能而且必須以「人民」為軸心。在此，毛澤東明確表達了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基礎。但當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後，情況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按照毛澤東「中介」理論的邏輯推演，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率領人民打碎了枷鎖，贏得了解放，顛倒了被顛倒的政治關係，恢復了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地位。這樣，在新型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體系中，主人們可以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自己選舉自己的政府，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這時共產黨就完成了自己作為「中介」的歷史使命，而應以一種新的政治因素在新的環境中發揮新的作用。因之，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環境，使毛澤東的政治理論內含著某種原則性突破的需求。

其實，毛澤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的。除了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以外，毛澤東還在多次批示中嚴肅批評過「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小生產狹隘意識。1950年訪蘇期間，毛澤東更是意味深長地對卡德爾說：「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辯證法在社會主義如何自由運用的問題。社會主義不是平靜的河流，應當有領導指引方向。但是，人民應當有對社會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應的可能性」。⁷在毛澤東這一時期的通信和批示中，我們可以直接看到他試圖使「人民主權」的概念生活化的意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命題做了如下的解釋：「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係，破壞舊的社會關係。……勞動者手裏有工具，沒有工具的可以拿石頭，石頭都沒有，有兩個拳頭」。⁸這種反映毛澤東深層觀念的話語說明，他實際上是把「生產關係」看成是「生產力」最為本質的內在要素。基於此種理解，他始終關注著執政黨的性質和功能問題，認為「黨-群」關係是中國國家發展的核心主題。

圍繞著這一主題，毛澤東反覆對黨內官員「擺老爺架子」、「擺官僚架子」的「國民黨作風和老爺習氣」，做了異常激烈的批評：「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⁹「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作風，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¹⁰從此以後，毛澤東對黨的腐敗現象的判斷愈來愈嚴重。認為全國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他們其間「有一些壞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對這些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捕一些，還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¹¹最後，毛澤東認為黨和政權都發生了質變，最終得出了非搞一場「革命」不可，必須「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的結論，¹²以此阻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全面復辟和修正主義在中國的無限蔓延。這樣，毛澤東的全面邏輯構思終於形成了完整的圖像，並沉澱在《五·一六通知》的語言和辭章之中，於是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社會政治實驗。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樣¹³：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與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即便在1976年病危之際，他還在表達這樣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後，一部分黨員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甚麼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

不難看出，在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哲學思維中，實際上形成了這樣一條邏輯線索：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已成為主人，但黨閥官僚階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在新的環境和條件下，人民再次淪為「奴隸」。「奴隸們」要想再次成為主人，仍然需要「中介」。在毛澤東潛意識中這個「中介」唯有自己。只有他自己才有足夠的膽識、責任和力量，率領著「奴隸們」「踢開黨委鬧革命」，重新反壓迫，「造反有理」，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主人，在具體的位置上實現抽象的自身價值，由此走向純正的社會主義彼岸。

歷史事實和研究結果都已證明，毛澤東上述理論體系並不是沒有問題的，其中隱藏著巨大的悖論。¹⁴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另文討論。這裏，我們只是試圖指出，毛澤東晚年的政治理論自有其自洽的邏輯體系，毛澤東有他自己自信的理由。

四 個人心理特徵的影響

在「心理動機」層面上，我們將看到一個極富魅力、棱角鮮明、充滿矛盾和耐人尋味之特殊人格的生動圖像。從能讀到的毛澤東文稿（包括公開發表的著作、即興講話、詩詞作品、讀書眉批等）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高傲、自負、「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氣度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渴望。這反映出毛澤東氣勢磅礴的膽識和超越凡俗的視闊。但這只是他的一個方面。同時，通過近年來出版的各種細膩、逼真的回憶錄，我們又被告之，毛澤東體察入

微，小心謹慎、揣摩至深，不易容人，有時甚至表現出某種與其身份不大相稱的狹隘。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就「虎氣」和「猴氣」在他身上共同有之。在心理學視角上，這兩個毛澤東並不協調，時時衝突，呈現出持續性的內在緊張（tension）。但是，無論是極度的豪放，還是敏感的謹慎，其心理的隱蔽影像和焦慮核心都是一個被充分放大的「自我」。用精神分析的規範術語表達，就是「邊際性症候的自戀主義」（the narcissism with the borderline syndrome）。¹⁵ 用通俗的比喻說，這種人格大喜大怒，打抱不平。不得志時具有「臥薪嘗膽」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後又會傲視群雄，拒絕不同見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權威挑戰成為其賴以存在的生活樂趣與精神支柱。由於這是一種「非同凡響」的人格，所以孤獨總會伴隨而行，而潛意識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張顯，其實是彌合其高度疏離感的必要補充。

在心理學理論中我們知道，過於自尊的人其實也就是最為自卑的人。在一定意義上，壓抑往往會成為創新的動力。而在毛澤東的心理辭典中，「人民」、「群眾」、「無產階級」等體現階級屬性的概念，往往成為「貧人」、「賤人」、「下等人」、「小人物」、「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壓迫者」等字眼的同義語。50年代末期，毛澤東讀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餞崔使君序〉一文時，抑制不住內心的衝動，信筆寫下了以下批語：「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幹的。……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幹」。¹⁶ 類似的態度就是在許多公開的會議上他也直言不諱。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講「破除迷信」問題時，一連列舉出近40多個古今中外、歷史、神話和現代人物，用以說明「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學派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學問比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¹⁷ 並多次強調，司馬遷不受辱刑寫不出《史記》，左丘明不被流放體驗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沒有《紅樓夢》了。1954年他支持李希凡、藍翎反駁《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大人物」壓「小人物」的不滿。通讀毛澤東當時給中央政治局和有關人士的那封信，我們很難說其直接矛頭是純粹對著俞平伯本人的。¹⁸ 1957年，當曾經是「小人物」的李希凡在大報上批評王蒙《组织部新來的年輕人》時，毛澤東又在這篇文章上批語道：「簡單化」，「使人讀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表示這回他本人站在王蒙一邊。¹⁹ 所以，把這兩件相隔不遠的事情聯繫在一起，僅從心理動機來說，毛澤東都是要表示出自己這個「大人物」要為「小人物」撐腰、說話的態度罷了。

總之，在毛澤東看來，凡是被壓抑的主體，必然內聚著天然的實現欲望，而壓抑別人的主體，又必然本能地產生墮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潑的、具有生命的動力，後者則是呆滯的，形成歷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卻蘊育著生機，後者雖然實力雄厚，但卻意味著衰亡。這樣，辯證法所包含的無情命題沉澱在毛澤東的觀念中，就形成了那個眾所周知的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毛澤東晚年的大量論述中，這種「壓抑—創新」的傾向表現得淋漓盡致。因而，毛澤東自信地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徑，也就是通過釋放壓抑去沖破墮性的過程。「無產階級」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力量，關鍵就是因為他們「一無所有」，「壓迫越深，反抗越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

在心理學的視野下，毛澤東又返回到了有血有肉、可能溝通的常人世界。這對深切體味他晚年思想和行為的動機，是多有裨益、不可或缺的分析層面。

真實的歷史使上述三個層面的內容交叉融合在一起了。「政治事件」、「思想結構」和「心理動機」有機聯繫，密切互動，從而構成一幅晚年毛澤東複雜而有序的思想畫卷。

五 社會記憶與歷史情境

周恩來曾精當地指出，「毛澤東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巨大人物」。²⁰ 這也就是說，毛澤東是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之歷史過程的產物。如果說，所謂「巨大人物」是指其對社會結構和觀念形態所具有的深遠影響力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說，這種深遠影響力的深厚基礎與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和群體情緒息息相關。必須把毛澤東研究置入一個長時段的歷史情境之中，才能對其巨大影響力的民族情感淵源給出一個明確的定位。

自1840年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不可抑制的生產力一次又一次地破碎了中國「天朝聖國」的幻夢。一種先進文明的擴展卻是以一個民族的屈辱為代價，這巨大的歷史悖論正體現出馬克思透視人類活動的深刻洞察力。在一個世紀的對外戰爭中，中國幾乎沒有在任何具有關鍵意義的衝突中取得過勝利，整體民族生靈塗炭，血流成河。特別是時距最近而恥辱最重的8年日本侵華戰爭，更是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烙下了難以彌合的痛苦和創傷。可以說，長期屈辱和壓抑所積澱下的激憤，已內化為中華民族現代精神中的潛在氣質。抗日戰爭勝利後，上海曾有資本家變賣全部家產購買鞭炮，整整放了幾天幾夜。這在經濟學上屬於非理性行為的舉動，實際上是再自然再合理不過的事情了。就是這樣一個飽償屈辱的民族，當有人振臂高呼：

「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²¹ 的時候，當人們相信只要拼命奮斗就可能在數年之內「超英趕美」，「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那麼，大躍進時期人們寧可砸鍋煉鐵，晝夜苦戰，甚至「真實地造假」，除了制度的原因外，不正是涂爾干（Durkheim）所精彩分析過的「集體歡騰」（Corrobori）的社會景觀嗎？²² 所以，當把具體的「社會事實」放到一個長時段的歷史過程中去的時候，思想的解釋將發生變化。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情境中，諸如「抗美援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大躍進」、甚至「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事件，就將可能得到超越表層之更為深刻的理解。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澤東之所以能夠被中國人所接受，在今天看來他的若干如此不可思議的超常舉動之所以能得到響應，其實都是近代中華民族屈辱記憶的情感宣泄和自我幻覺之「集體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的必然反映。

與此直接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那時人們對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崇拜」。如果忽略掉作為後發型現代化國家的精神特質，那麼，把這一愚昧現象歸結為中國傳統權威崇拜的持續影響，是極其合理的解釋。但當考慮到近代中國特殊而複雜的歷史情境，我們就不得不說，轉型過程中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需要「卡里斯馬」（Charisma）的時代。從政治心理的角度講，一種組織化的群體、一個政黨、甚至一個民族，都需要一個凝聚公共精神的符號，一個提供價值的認同的中心。某個群體越是處於弱勢，越是面臨艱難，這種對於公共政治符號的需求就來得越迫切，越強烈。²³ 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中國社會是從傳統王權結構轉型而來的，在一定意義上，是用一種現代政黨的組織形態替代由於傳統王權結構的崩潰而留下的權威空缺，加之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種利益集團又處於激烈的競爭之中，所以現代中國制度轉型中滲透著舊制度遺留下的深層因素，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依據制度主義學派關於「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t）的解釋，在這個背景下，各個政治集團面對激烈的競爭，都必須建構自己的標誌性政治符號，以此增強內部凝聚力。國民黨選擇了孫中山，而共產黨則選擇了毛澤東。所以我們說，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現象，是歷史傳統和現代需求之綜合作用的產物。顯

然，這與人為製造政治符號假象的愚蠢舉動，不可同日而語。在純理論的層次上，這一現象是馬克思階級競爭學說、韋伯合法性類型分析和涂爾干宗教精神原理所共同探討的對象，具有很深的意義內涵，值得展開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綜上所述，複雜的事物必須使用綜合的工具予以解釋。對於長時段具體歷史情境的自覺關照，也正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擺脫黑格爾所謂「讓巨大的結果從微小的原因發出」，用「軼聞奇事」解釋歷史行為的「常見的笑話」。²⁴

六 「缺失閱讀」：初步的分析

通過上述的層次梳理，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由四個要素共同作用的分析系統。下圖表示了這個系統基本結構和內容：

歷史情境	中國近代社會所形成的強烈壓抑感，激發了整體民族自強自立的意志。民族自我實現的緊迫性，成為當代「中國精神」的內在靈魂。									
形式	事物分類	1949	1952	1956	1958	1959	1964	1966	層次類別	潛在主題
表層	政治事件	開國奠基	土地改革	整風反右	大躍進	廬山會議	四清整黨	文化革命	經驗層次	抑制腐敗
中層	思想結構	合法性	主體奠基	政治限制	經濟突破	高層爭議	新階級	主體再現	邏輯層次	主體身份
深層	心理動機	成功自信	初步實現	再次實現	高度衝動	心理警覺	危機意識	最後冒險	潛意識層	自我實現
缺失分析	以頻繁的人事變動防範和治取合法性危機（不是權力危機），但國家層面上的憲政建設和制度創新，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呈現明顯空白。									

第一，我們要把面對的研究對象和社會現象，放進一個較長時段的歷史情境中去，充分考慮傳統遺產和社會心態對群體之道德準則、思維方式和情感認知的型塑限定（formulation）。本質上，社會心智必然受到集體記憶和歷史情境的制約，在人類政治生活中主觀意志的隨心所欲是不存在的。

第二，我們從圖表的整體角度看，顯然1958年「大躍進」把歷史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屬於建立和鞏固新政權合法性的時期，我們稱之為「外傾型」，亦即毛澤東的思考中心明顯傾向於向外開拓；而後一階段則屬於合法性動盪時期，我們稱之為「內傾型」，以後毛澤東愈來愈把問題歸結為黨內衝突、並把黨與社會的關係提到了中心的議程。這樣，「大躍進」就作為一個承前啟後的分界線，具有了特殊的意義。研究毛澤東晚年思想與行為，「大躍進」的興起與失敗，發揮著關鍵環節的作用，成為毛澤東晚年轉變的最重要的動因，必須進行細致的具體分析。相對而言，目前學術界特別關注的「文化大革命」，則只是這一關鍵轉折的邏輯後果而已。

第三，從橫的方向分析，我們會看到三個層面各自具有不同的主題，但它們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要素相關。「政治事件」相對來說是表層，呈現出無序的動盪起伏形態；而這種無序運動卻實際受到毛澤東政治思想結構的邏輯秩序所制約；毛澤東這種政治思想結構又是以其特殊經歷和心理體驗所形成的道德意識為基礎。在這裏，三個層面之間的互動和作用，展示出毛澤東複雜多元的精神世界與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狀況之間的一致性。

第四，按照阿爾都塞的「症候閱讀法」（symptomatic，也可譯為「缺失閱讀法」），思想家從未涉及的「視閾」（horizon）或論題，即被他省略而「缺失」的部分，恰恰是研究者應當深入分析的地方。在思想家觀念中的「看不見」之處，其實極其明確地泄露出這一思想體系

的本質。²⁵ 從我們的分析框架中可以明顯看到，在三個主要的層次中，在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建構和重塑方面，缺乏基本的原創性動力。政治關係的調整以行政人事變動為主要手段，而憲政體制的指導和制約，原則上處於空缺狀態。或許正由於毛澤東晚年過分相信「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的自我力量，以至於他本人自認為具有完美邏輯的思路，在政治實踐中則產生了嚴重的扭曲。這樣，在被毛澤東晚年所「看不見」地方，我們所「讀」出的明確信息是：缺失「憲政約束」的「民主意願」，必然開啟從「群眾運動」走向「運動群眾」的邏輯通道；放棄制度規範的高度道德責任，不足以構成追求善之目標的終極依據；「整體平等」與「個體自由」之間的內洽關係，是困擾當代中國的首要政治哲學命題。

在歷史天平的一端上，是一位偉大政治家、思想家得到充分實現的個人價值；在歷史天平的另一端上，則是一個千年大國在政治制度建構方面的整體缺失。由這二者所形成的矛盾和緊張，給我們的民族留下了過於凝重的社會記憶和耐人尋味的思考空間。

註釋

- 1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據統計，在《毛澤東選集》中，引用孔子等中國傳統經典的話要比引用馬克思的話多四倍以上。其中儒家和新儒家作品佔22%、道家和墨家作品佔12%、民間傳說、純粹俚語佔13%、其他中外作家，未分類佔7%、馬克思、恩格斯佔4%、列寧佔18%、斯大林佔24%。See, Vsevolod Holubnychy (1964), "Mao Tse-tung'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China Quarters* 19 (7-9):16.
- 3 參閱拙文〈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趨向〉，即將發表。
- 4 參閱蕭延中主編：《國外學者評毛澤東》，第四卷《「傳說」的傳說》（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頁101。
- 5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 6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頁769。
- 7 卡德爾：《蘇南會議？莫斯科宣言？會見毛澤東》，載《世界歷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12期。
- 8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9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10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 11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32。
-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56-358。
- 13 在《516通知》中，毛澤東親自加入9段重要修改和批語，此段是其中具有本質性的結論部分。
- 14 參閱王振寰、錢永祥《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0期（1995年8月）。
- 15 Lucian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6). 此書之中譯本即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 16 張貽玖：《毛澤東和詩》（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

- 17 毛澤東：《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第一次講話》（1958年5月8日）。
- 18 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43。
- 19 毛澤東：《在頤年堂的講話》（1957年2月16日）。
- 20 〈學習毛澤東〉，《周恩來選集》上卷。
- 21 毛澤東當時在政協講話使用是「中國人」這一極具民族性的詞匯，而不是「中國人民」這樣具有明顯階級性的語言。顯然，使用「中國人」來概括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民族身份認同的深刻內涵和整體歷史記憶的厚重意義，聯繫毛澤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所寫的題詞，這種意義就更加明顯了。參見：毛澤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文集》第五卷。
- 22 參閱涂爾干（Emile Durkheim）著，渠東等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二卷，第七章；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編，戴聰騰譯：《迪爾凱姆社會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 23 參閱：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增訂版；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章緒論，頁39-41。特別是其中對於希爾斯（Edward A. Shils）關於「卡里斯馬中心」理論的解說。
- 24 黑格爾：《邏輯學》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頁221。
- 25 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巴里巴爾（Etienne Balibar）著，李其慶、馮文光譯：《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張一兵：《問題式、症候閱讀與意識形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蕭延中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副主任、副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一期 2003年12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一期（2003年12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